

理论的弘扬与创新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研究

刘俊哲 余仕麟 李元光 卫 晋 编

上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LILUN DE HONGYANG YU CHUANGXIN

理论的弘扬与创新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研究

上

LILUN DE
HONGYANG
YU CHUANGXIN

刘俊哲 余仕麟 李元光 卫 晋 编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目 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阈中的中国传统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学术研

讨会综述 朱康有 李青(1)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若干问题

..... 许全兴(1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文化背景 许全兴(21)

从批判法向融通法的根本转变

——马克思主义哲学承继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论新探

..... 刘俊哲(38)

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传播与理解 宋志明(51)

毛泽东“实践论”的中国性格 李维武(65)

略论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 柴文华(94)

毛泽东的实践论与传统知行观的近代嬗变 陈卫平(122)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军事成果与中国传统哲学

..... 李 青(144)

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道德基础 唐志龙(160)

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几点哲学思考 张书军(173)

论冯友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

——兼评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援引与创新

..... 高秀昌(183)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学术路径”的“文化综合创新论”

..... 苏志宏(209)

关于“结合”的若干思考 王兴国(217)

马哲与中哲的融合创新及其面临的挑战 杨 娅(229)

解读与选择

——从“仇必仇到底”说开来 刘长城(245)

由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生态伦理化问题透视生态学马克思

主义的中国化 王 广(272)

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影响 王向清(284)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关系的一个个案

——胡汉民《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 王炯华(303)

从斗争哲学向和谐哲学的递嬗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转向

..... 王思义(310)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之路 刘道明(321)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批判 王建国(332)

毛泽东的宗教观管窥 孙金波(344)

中国走向自由之路的哲学思考

——冯友兰文化观解读 胡 军(355)

儒家法家的核心正义观及其现代解读 陈少峰(382)

老子的中观哲学与人类社会价值的重建 胡伟希(392)

评老庄“无为”哲学 余仕麟(409)

析藏传佛教认识论的特点	李元光(433)
历史主体的缺位	李蜀人(443)
道家哲学当代三性	杨翰卿(459)
价值迷失/重建视阈中的现代新儒学研究	段吉福(471)
论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精神内涵及当代价值	贾秀兰(502)
“和”的哲学:中国哲学对世界未来哲学的最大贡献	
——冯友兰先生最后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哲学遗产	
.....	沈素珍 钱耕森(513)
谢无量与《中国哲学史》	田文军(524)
生命体验与哲学建构	
——熊十力哲学体系基点探秘	李祥俊(541)
日丹诺夫哲学史讲话的引入与反思的考察与反思	
.....	乔清举(556)
中国历史上的发展观	朱康有(578)
对宁玛派大圆满法的一种新解读	王 玲(593)
浅谈竹林玄学对庄子齐物思想的继承及表达	郭 镭(617)
“中”“和”之理论意蕴辨	程志华(625)
论康有为《大同书》中的“去家界”	李 兵(645)
济世与弘道	
——管窥梁漱溟先生的文化哲学	李 姪(661)
实践:张岱年早年哲学思想的核心	吴全兰(669)
重建儒家哲学	涂可国(682)
刍议牟宗三现代新儒学人性观及其若干问题	汤忠钢(696)
“确定”之谜	
——试析金岳霖论“确实性”和“确定性”	邵 明(713)

论张岱年外界实在论证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超越	韩立坤(734)
论陈云同志实事求是的领导思想	李毅弘(746)
中国官本位的历史考察和现实分析	高静文(756)
“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与和谐文化建设	黄 静(768)
论佛教的世俗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撒 玛(778)
和合社会之民策	
——孔子与老子“愚民”思想比较	唐 娟(790)
主客相分与主客同一	
——从西方哲学的视角看孔孟与老庄认识论的差异	
.....	陈锦宣(797)
编后记	(808)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阈中的 中国传统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

学术研讨会综述

朱康有 李青

由中国现代哲学学会主办、西南民族大学政治与社会学学院承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10月13日至15日在成都举行。来自全国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六十余位专家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内涵 许全兴认为，主要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的实际相结合，指导改造中国的实践，再将实践经验上升为哲学理论；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历史文化相结合，吸取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使之具有中国内容、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与中国的历

史、文化融为一体。前者是基础，后者也不可少。一般研究者主要是从前者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导致对其内涵理解上的偏颇。其实，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的文化人在总结“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已从不同视角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中国化问题；毛泽东吸取并超越了这一思想，提出要研究历史，不应割断历史，从而正确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现实实际三者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要求 刘道明认为，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使中国更好、更快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来实现。王思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经历了由斗争哲学到和谐哲学的演变过程；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和谐思想应当建立在中西哲学的互补性、融合性、整合性上，并以“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为最高境界。为此，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学术思想上的全面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它所固有的进步思想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精华部分相结合的过程，这个结合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王建国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必须与中国的时代气息和民族特色相联系。王炯华认为，谈“中国化”，有一个站在什么样立场上的问题。王兴国认为，“中国化”中的融合还处在初期阶段；“中国化”的成果不止是为政治辩护，还应为老百姓提供一个精神家园，并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美学与伦理思潮表现 苏志宏整理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要素，找到贯通二者之

间内在的接榫点是“和谐”，认为和谐社会理论特别是和谐文化建设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资源、传统美学思想资源和其他相关文明资源之间的相互涵化和补充，才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性美学思想体系。柴文华认为，一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实践家开创了一种不同于西化派和早期现代新儒家的新的伦理思潮，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这种伦理思潮探讨了道德与经济、道德与阶级、个人与集体、两性伦理等一系列问题，对中国现当代伦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现实困境 王四达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前提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逻辑延伸。但是，马克思主义“化”世界的应然正在被世界“化”马克思主义的实然所取代。从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指导思想来说，“中国化”的应有之意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即主义改造国情，民族性顺应时代性，决不能主次不分。鉴于中国封建历史与传统的强大惰性，应特别警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被有意无意地导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歧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摸索出一条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切合中国社会现实的道路，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成功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前提和目的 王兴国认为，“结合”的前提是，必须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

系和基本原理，把握好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基本原理及范畴的准确内涵；“结合”的目的不能仅限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指导和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也不能只限于将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些原理或范畴用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原理或范畴，“结合”的最高形式和最终目的应该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之上，构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新的哲学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方法论 刘俊哲认为，以前对中国传统哲学主要不是价值认同，而是建立在价值分裂基础之上的批判法占了主导地位，从而延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承继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论应当是与批判法相对立的“融通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下，打通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长期隔阂状态，最大限度地吸纳中国传统哲学有价值的成分，使之尽可能多地融注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这种方法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不完全中国化向完全的中国化转变，能够使对传统哲学的充分否定向充分肯定的方向转变，能够使从以前对传统哲学点滴式的、个别的承继向多角度、全方位承继转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基本要求 许全兴认为，应立足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进行总结和概括，而不只是把后者当成注释和证明。继承和发扬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优秀传统文化，达到两种哲学精神、两种文化传统和不同民族灵魂的融合，是最深层次的结合。要处理好中国现当代哲学中，作为主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学派（比如同样是外国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产物的现当代新儒家）的关系。张文儒认为，以前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合并

不令人满意；一些中国哲学术语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有区别，需要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道路上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和细致的比较，才能得到进步和发展。赵文舟认为，“结合”应从专题入手，一个一个的问题来研究和解决。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深刻教训 乔清举认为，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研究的讲话包含斗争史观、目的史观、革命史观、服务史观等内容；这一模式在哲学史的研究和运用过程中出现了教条主义的弊端，表现为从唯物唯心的概念出发而不是从史实出发、把马克思主义表格化等；由于政治因素的外在强化，它造成了民族理性的扭曲，干扰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许全兴指出，在结合中，应警惕中国传统哲学消极因素的渗入。余仕麟通过评述老庄“无为”哲学的理论缺陷、非道德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倾向对民族的消极影响，揭示了道家哲学的缺陷。高静文认为，当代实施以人为本理念的障碍是历史已有的“官本位”思想；现代“官本位”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文化的影响和权力机制的缺陷。陈少峰认为，“正义”就是人们得其所应得，得到同等的对待；“正义”价值观包括三个方面：基本权利，扩展权利，发展权利；而中国古代儒家只考虑了基本权利——温饱问题。李蜀人根据海德格尔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思想，认为历史的发展变化就是人类历史精神的发展变化；古代和近代中国的历史没有形成理性的主体精神，当今中国仍需要历史精神、历史意识、历史主体的重建，以达到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彻底批判和瓦解，使理性自由精神得到彻底解放。

三、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

王向清认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进程主要包括三个阶段：一是井冈山时期的准备阶段，二是延安时期的系统化阶段，三是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充实、完善阶段。

李维武认为，毛泽东的“实践论”固然吸取了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果，但决不能简单地视为“深受这种‘原理’文化的影响”的产物，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毛泽东的哲学兴奋点已经实现了由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移，并深受重现实、重实践的湖湘学风的影响，更直接指向中国现实，是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解答；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一种外来哲学，变成了能够为中国人所掌握、所运用的思维方式。陈卫平认为，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传统知行观在近代嬗变的必然产物。知行范畴、知行主体、知行过程、知行作用在近代的嬗变趋势是以凸显面向客观现实和重视主体能动性为轨道的，毛泽东的实践论正是这两者的统一，并克服了其矛盾和模糊的一面，作出了新的提升和概括。

李青认为，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伟大理论成果中最具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一朵奇葩。中国传统哲学是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许多内容比如战争观、战争本质论、战争认识论等等，是对中国传统军事哲学的批判继承与超越，并且今天仍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孙金波认为，毛泽东的宗教思想处处体现出马列主义宗教观

的基本原则；把宗教问题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进行具体分析，从而在许多方面都对马列主义宗教理论——对宗教本质根源的认识、如何处理宗教类的问题以及对宗教的定位等等——有所丰富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突出表现。

四、中国近现代哲学与“中”、“西”、“马”的融合

中国近现代哲学是对“中”、“西”、“马”的融合 杨姪认为，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传统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融合与渗透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以西方哲学特有的理论思维、时代特征和科学境界提升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品位和价值。张汝伦认为，中国近现代哲学不能以保守或激进来划分，有很多思想家（如章太炎）没有被反映出来。中国现代哲学面临的问题是：有哲学的称谓但不一定明白什么是哲学；将哲学史等同于革命史；没有处理好“中”、“西”、“马”的关系；中国现代哲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打通“中”、“西”、“马”的界限，创造一种新的“中国现代哲学”。胡军认为，中国哲学的近现代划分受到革命和政治的影响，但是学术还是应该和政治分开。李兵认为，“中”、“西”、“马”融合除了政治层面、学理层面外，还有一个生活实践层面；如果没有在生活上融合，理论的融合是没有意义的。陈名财认为，中国现在处于一个转型期，需讨论并解答的问题比较多；原来的马克思主义没有给我们提供答案，所以“中”、“西”、“马”的结合势在必行，关键是要找到好的结合平台。卫晋提出，首要的是为“中”、“西”、“马”平等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

冯友兰对“中”、“西”、“马”的融合研究 高秀昌认为,冯友兰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援引、运用的过程中,虽然存在着种种误读和曲解,但也有不少的创新——他形成了自己比较系统、完整的,内化于己身的具有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中国哲学史观,“抽象继承法”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作了进一步的拓展;正是这种创新,使得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始终走在前列,成为中国哲学界的领军人物。胡军认为,冯友兰之所以与其他学者处理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几种原则不同,原因在于他基于新实在论和唯物史观支撑的文化观不同——文化之间的种种差异并不是东西或中西之间的不同,而是古今、新旧的差异,或者更形象地说是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差异。冯友兰从经济决定论的角度研究和评判东西文化之间的关系,主张通过产业革命,引导中国走向自由之路,这是有局限性的。思想的变革与经济是同步的。经济依赖于思想的创新、科学的发明、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必须首先取得学术的独立。这些又都要依赖于政治上完善的民主制度的确立。沈素珍、钱耕森指出,冯友兰 20 世纪 20 年代提出、90 年代倡导的“和”的哲学,是有预见性和启导性的,是他最后遗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哲学遗产——“和”是中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的核心,是中国哲学对未来世界哲学的最大贡献,是中国哲学“为万世开太平”和建立世界持久和平的最宝贵的哲学。

其他现当代思想家对“中”、“西”、“马”的融合研究 陈刚从唯物史观角度评述了康有为结合中西之说的资产阶级社会观。段吉福认为,加强对新儒家的研究,可以推动中国现代哲学的研究。李娅讨论了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中西文化交流和冲突时的心态和应对之方。李祥俊认为,熊十力借用佛教概念和

西方哲学话语，对自己的生命体验从认识论上作了解说，并从中提炼出了作为其哲学体系建构的原初基点和终点的“性智”概念；中西哲学融合的模式只能是以中学的“性智”统摄西学的“量智”。汤忠钢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观角度，评述了在唐君毅中西人文精神比较诸问题的文化哲学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文化观。邵明认为，金岳霖晚期吸收和发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点，在论述客观事物的确实性和思维认识的确定性及其相互关系上，修正了前期思想；这种可贵的探索并不算成功——客观事物的可知性及其唯一的确实性并不是自明的，是一个需要长期探索的理论难题。韩立坤指出，张岱年在20世纪40年代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对“外界实在”进行了一些深入研究，以此来实现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补充和超越；他在批判西学基础上所做的哲学创新工作，对研究近现代哲学的发展历程有重要的意义。王向清认为，冯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下，超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峙，建构起体系化的“智慧学”逻辑结构，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贡献。

五、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关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 涂可国提出，在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语境下，提出重建儒家哲学显得非常必要。他从现代哲学学科分类的角度对儒家哲学进行了分类，揭示了其丰富多样的内涵，认为加强对儒家哲学的研究，有助于丰富与完善中国哲学体系，为整个中国哲学重建提供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黄玉顺认为，“中国哲学合法性”是一个伪问题，关键在于我们怎样理解

自己的哲学。田文军认为，应当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同中国哲学史学结合起来。他考察了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的内容、方法及其理论得失，评述了它在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形成上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

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 周北辰探讨了“儒家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和立法原则。他提出，“儒家社会主义”提供的“中国道路”超越了西方现代文明之路——后者基于“利益诉求”的核心价值，背离大道并导致各种现代化的问题；在学习西方时，要注意汲取儒家思想，建立自己的“文明有机循环体”，避免走上“利益本位”和“以夷变夏”的自我毁灭之路。杨翰卿认为，道家哲学思想文化在理论层面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相同相异、相通相融的关系，在实践层面与现实社会生活具有渗透亲和性，在精神层面对个人心理具有抚慰调适性；探讨道家哲学思想文化蕴含的发展原理及和谐观念等思想，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中国化，发展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同时也是使道家哲学思想文化获得提升、发展和发扬光大的需要。胡伟希提出，老子的思想并非消极，他关于道的论述重点放在如何解决人类生存面临的深刻悖论——“有欲”与“无欲”的对抗问题上，并给出了一条保持适度平衡的“中道”解决办法；这启示我们要重新厘定人类生存质量与生命价值的观念，重视人的精神生命，正确看待物质财富欲望的满足，把握历史机遇，及时提出人类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

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蔡方鹿分析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大同思想、辩证思维、知行统一等与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共产主义、辩证法、理论联系实际等的异同关系，认

为二者之间可以沟通。王广认为，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中有认同现代生态伦理的部分主张，如再能积极汲取现代生态科学知识、汲取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弥补其不足之处，亦可为建设中国气派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供借鉴。朱康有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发展观思想可以概括为天人之争、王霸之争、今古之争、农商之争以及集权与分权、改革与守旧、德治与法治、开放与闭关、统一与分裂等问题的交锋；这些涉及中华民族的重大发展观问题，有的甚至触及目前的现实，影响和制约着社会前进的步伐，也为我们今天更科学地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

六、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

和谐文化建设 张小平探讨了和谐文化及其理论建构问题。她分析了当前多元、多样、多变的文化现状，提出我国对外应以民族文化为主，对内要处理好和谐文化中一元与多元的关系；和谐文化建设无论是对内对外都具有战略意义；与西方的斗争文化特色相比，中国的和谐文化反映了未来人类的共同追求。张书军认为，构建和谐社会要以实践为基础和纽带，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以社会进步和社会文明为目标，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为前提，重视人的素质，这些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相关内容为指导。唐志龙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充分发挥中国传统哲学的积极功能，打牢道德基础。

“和”的传统思想 程志华认为，儒学“中和”思想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孔子和《中庸》为代表、以朱熹为代表、以王夫之为代表的三个时期，又分别为“中和”思想的“形而上化”建